

尼克松眼中的毛泽东和蒋介石

尼克松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时，曾于1953年11月访问过台湾，和蒋介石作过交谈。

这一回（1972年2月），他又会晤了毛泽东。这样，尼克松对毛泽东和蒋介石有着一种比较之感。后来，他写了回忆录《领袖们》一书，其中对毛泽东、周恩来、蒋介石作了颇有见地的比较。

尼克松写道：

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，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个人的历史：一个是毛泽东，一个是周恩来，还有一个是蒋介石。打败了蒋家军队，毛泽东巩固了在大陆的统治。中国共产党人把毛蒋之间的斗争看成是上帝与魔鬼之争……周恩来则往往不露锋芒，孜孜不倦地工作，是保持国家机器不断运转的赤胆忠心的官员。蒋介石在台湾实行个人专制，不像毛那样过分自我尊大，他维护自己的威严，努力使经济起飞，鼓励在台人员保持有朝一日返回大陆的希望。

三人中，我认识蒋的时间最长。我把他和蒋夫人看作朋友，不同于另外两人，我们有私交，那是共同信念和原则的产物。但是毛和周是在中国大陆取得了战争胜利的人，而在两人中，周是得天独厚的人，对权利的实际情况洞若观火。现在他们三人都成为古人了，但是周留下的影响，在当代中国将与日俱增。

尼克松比较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手势，发觉两人都喜欢“用手一挥”。尼克松于是把毛泽东和蒋介石作了如此比较：

1972年毛向我提起一件事。他讲时用手一挥，指的也许仅仅是我们的会晤，也可能指的是整个中国。他说：“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是不会赞成的。”隔一会儿，他又补充了一句，“我们同他来往的历史，比起你们同他来往的历史，要长得多。”

1953年我同蒋第一次见面

时，他谈到中国也用手一挥，清楚地表示，他的话既指孤悬海外的台湾堡垒，也指中国大陆。

我觉察到他们两人在提到自己的国家时，都有点秦始皇帝的口吻。两人的姿态和讲话似乎给人一种感觉，他们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。两个这样的领袖在历史中相逢，只会冲突，不会妥协。一个成为征服者，另一个成为被征服者。

在和毛泽东见面时，尼克松跟他当面谈起了蒋介石。

尼克松说：“蒋介石称主席为匪，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？”

毛泽东一听，哈哈大笑起来。周恩来趁这机会，替毛泽东作了答复：“一般地说，我们叫他‘蒋帮’。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，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。总之，我们互相对骂。”

尼克松这样写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：

毛举止随便，说话爱简略，给我的印象是有成打的问题同时在他脑里转动。他讲他的意见，心平气和，语调平淡，在一个规模较小的会场会引人注意，但不是雄辩之才。

即使在说明重大观点时，他也喜欢语惊四座。“你们上次选举时，我投了你一票。”他笑着说。我说他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。“我喜欢右派分子。”他回了我一句，似甚得意。

“有人说，你们是右派分子（共产党是站在右翼的），说希恩首相也是右翼的。”我加戴高乐的名字，毛有点迟疑，说戴高乐另当别论，却又说，“他们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翼的。我比较喜欢右翼人士执掌政权。”我在提到我们恢复外交关系时总结了一句，我说：“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应该注意到在美国，至少在目前，是右翼人士能够采取行动，而左翼人士只会说说而已。”

尼克松也写下了对蒋介石的印象：

蒋披一件十分整洁的黑



毛泽东与尼克松

色斗篷，头剃得光秃秃的，在私人场合，同他那肃穆寡言笑的态度相得益彰。在我说话时，他惯于不假思索地连声说“好，好”，显得有一点紧张。

他双眼的神采给人自信和执拗的印象。眼眸是漆黑的，有时闪出光芒，在我们交换意见之前，不时环视办公室各处，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，就盯着我的眼睛看。

尼克松甚至还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夫人作了比较。

尼克松在台北和蒋介石谈话时，由宋美龄担任翻译。在尼克松的印象中，“蒋夫人远远不只是她丈夫的翻译”，“我认为蒋夫人的智慧、说服力、道义上的勇气，单凭这些就足够使她成为一个领导人物”。“她妩媚端庄，这样或多或少地冲淡了蒋那副冷酷的形象”。

尼克松把宋美龄和江青作了如下比较：

蒋夫人同毛的夫人江青相比，比之蒋毛本人之间的对照更加鲜明。蒋夫人有教养，打扮入时，很有女性的风度，但又是很坚强的人。江青粗野，毫无幽默感，完全没有女人特点……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她更加冷酷、更加俗气的人。她为我的访问安排了一个文化宣传的节

目，我们坐在一起，她没有一点毛的温暖热情，也没有一点周的翩翩风度。她是如此之紧张，以致手上额上出现了汗珠。她头一句带有意见的话，典型地表现了她令人讨厌的挑衅态度。她问我：“你为什么到了现在才来中国呢？”

在世界上，既见过蒋介石、又见过毛泽东的人不少，能够用尼克松如此敏锐的目光把两人加以深刻比较的，却不多见。

尼克松这次访问中国大陆的成果，凝结于2月28日在上海和周恩来所签署的中美联合公报，史称《上海公报》中。《上海公报》中的妙笔，是那位“智多星”基辛格博士想出的。

美国政府认识到，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。

基辛格巧妙地抓住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共同点——只有一个中国——在公报中写上了这段既不得罪毛泽东又不得罪蒋介石，却申明了美国政府立场的话。

摘自叶永烈《毛泽东与蒋介石》（四川人民出版社、华夏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）

美中一半老人营养不良

近日，美国“网络医学博士”刊文指出，最新研究发现，美国65岁以上的急诊患者中，16%营养不良，60%存在营养不良或营养不良风险，而且超过3/4的老人并不知情。

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、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营养与食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付萍教授说，我国老人的营养状况更为严峻，同样令人堪忧。调查显示，大多数老人不了解自身的营养情况，还有些老人盲目吃素、减肥，最终瘦到皮包骨头，导致晚年生活质量很差。老人营养不良这个现实问题，必须引起重视。

美国这项研究显示，营养不良风险最大的老年人群依次为患有抑郁症的老人（52%）、依靠辅助器具生活的老人（50%）、吞咽食物有困难的老人（38%）、难以外出购物的老人（33%）。该研究负责人、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博士蒂莫西·普拉茨-米尔斯表示，这个结果令人感到震惊，老人营养不良的现实已经十分严峻。

付萍介绍说，两年前，我国按照国际通用的营养不良筛查标准，针对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重庆、成都5个城市65岁以上老人进行营养状况调查后发现，超过50%的人存在营养不良风险。“这5个城市都是发展较好、生活水平较高的城市，农村的情况一定更为严峻。如果统计80岁以上老人营养情况，营养不良比例可能更高，会超过一半。”付萍担忧地说。

据《生命时报》

“我”在古代是种兵器

“我”在古代是一种兵器，不是现在第一人称代词。“我”与“伐”、“战”、“戟”、“戣”这些打打杀杀的字长得很像，说明“我”在古代与它们是近亲，与现在“我”的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。

《说文解字》上说：“我，古杀字。”“我”这种武器盛行于商至战国时期，秦以后逐渐消失。根据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西周时期的青铜“我”和现藏于陕西扶风博物馆西周时期的青铜“我”来看，“我”的形状有点像《西游记》里猪八戒扛的铁筢子，只不过“我”是三根齿罢了。“我”是一种短兵器，装上长柄后才能用于战场上砍杀，那尖尖的三角刺砍将下来时，一般的皮甲胄都是难以保全的。

在古代“我”是兵器的时候，人们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是“朕”、“寡人”、“不才”、“不佞”、“小人”、“贱民”以及“余”、“吾”等等，当然使用最多的还是“余”“吾”二字。那时候“朕”、“寡人”都不是皇帝的专用词，《尔雅·释诂》中解释说：“朕，身也。”秦始皇统一天下后，规定“朕”只能是天子自称。至于“寡人”，更是大众用词，《诗经·邶风》中就有“先君之恩，以勖寡人”等等，“寡人”到了唐代，才成了皇帝的专称。

“我”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用，最早见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，当时的“我”作为代词用，指的是“我们”。“我”是怎样由兵器转为人称代词的呢？原来“我”是会意字，它从戈，戈是古代具有代表性的武器，很容易激起大家的斗志，所谓枕戈待旦，大丈夫当“能执干戈以卫社稷”。因此武士们常取戈自持，凡持戈之人，皆归属我方，“我”便引申出表示自我的意思，从那时沿用至今，再也没有变动过“我”的意思。据《广州日报》

甲午海战中的宁波留学生

宁波教育博物馆（筹）几经考证，发现在甲午战争中有三位宁波留学生的珍贵史料。

1894年9月17日，清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旗舰“定远”号和“镇远”、“致远”、“济远”号等10艘战舰，在黄海的波谷浪峰中疾驶，“旗帜飘舞，黑烟蜿蜒”，反击日本旗舰“松岛”号和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的巡洋舰“西京丸”号等12艘兵舰。这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惨烈的一次海战。

“定远”、“镇远”号是德国制铁甲炮塔舰，定员329人/艘，为北洋舰队中排水量最大（均为7335吨）的一对姐妹舰。“定远”号管带（舰长）右翼总兵、留英学生刘步蟾，管轮是宁波府慈溪县人王如璋，枪炮大副沈寿望（坤）。王如璋和沈寿望皆是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，他们的帮教（教官）王凤喈，系王如璋之胞兄，乃浙江最早的公派留学生。

激战中，沈寿望等炮手多次准确发炮，先后击中“松岛”号炮塔，击穿“西京丸”轮机室、两舷和甲板，击毙日炮手数名……

后“定远”号遭5艘日舰围攻，被击中起火，桅楼和甲板上设施被毁，千余弹坑密如蜂巢，但除17位将士阵亡外，其余丁汝昌等官兵同仇敌忾，无一畏缩不前，被随舰英籍顾问戴乐尔誉为“不沉的定远”，直至持续5小时的鏖战结束后，才和“镇远”号等6艘战舰转舵返航旅顺口。而邓世昌任管带的“致远”号等4舰则被日舰击沉击毁。

清同治十三年（1873），在清廷选派的第二批幼童赴美留学生中，有宁波府王凤喈（慈溪）、王良登（定海）、丁崇吉（定海）和陈乾生（鄞县）4人，这是宁波也是浙江省最早的公派留学生。光绪七年（1881），清政府突然撤回留学生，由朝廷分配至福州、上海

和天津任用。宁波府4学子均赴天津，王凤喈到刚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，经学习后任教习8年，成效卓著。

1884年12月21日，李鸿章在《天津水师学堂请奖片》中奏称：“课成肆业美国回华学生王凤喈等九名，或充学堂帮教，或经分派各船，成效历有可稽……合理酌拟奖叙，缮具清单，恭呈御览。仰恳天恩俯准。照拟给奖，以资鼓励”。1889至1894年，清末外交官薛福成（曾任宁波绍台道台）出使英、法、比、意四国，王凤喈随同任翻译，成为宁波和浙江省第一位留学生外交官。可惜在归国途中，他不幸染黑热病，死于轮船上。

陈乾生，在义和团事件中不幸被害于天津，英年早逝。王良登和丁崇吉均至北洋水师天津大沽炮台鱼雷局，参加中日甲午黄海大战（任舰队中的鱼雷队长），碧血疆场。

1885年4月17日，李鸿



丁崇吉

章在《奏陈留美学生回国就业请奖折》中提请进行对留学生“择尤酌保，以奖成劳”，其名单中就有在甲午战争中立下军功的王良登和丁崇吉，拟“赏加守备衔”、“以把总尽先拔补”。后王良登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，丁崇吉至上海海关工作。

宁波教育博物馆（筹）胡审严